

TIBETOLOGY
TRANSLATED
TEXT

第十辑

国外藏学
研究译文集



二十世纪的西藏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

张植荣 主 编

肖 蓉 副主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志国
封面设计 瞿跃飞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25 字数：300千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7-223-00585-8/Z·38
定价：5.60元

(藏) 新登字01号

目 录

- 序：国外藏学的演变与特点 杨公素（1）
- 为何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吴天威著 杜永彬译（5）
- 西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
（苏）节昂列夫著 张方廉译（17）
-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
（苏）节昂列夫著 张方廉译（22）
- 古德使团与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
（英）阿拉斯塔·兰姆著 刘敬师译（90）
- 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 李凡武 张道安译（122）
- 世界屋脊
（美）A·汤姆·格兰菲尔德著 何桂金译（148）
- 英国在西藏的扩张 （苏）节昂列夫著 张方廉译（174）
- 美国、西藏与中国 （美）N.C·霍尔著 成军译（286）
- 美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
克里斯·穆林著 张植荣译（305）
- 几乎被人遗忘的西藏冲突
T.D·奥尔曼著 刘敬师译（319）

美中央情报局操纵西藏叛乱

(日) 高桥照著 欣华译 (322)

西藏三十年

(美)琼·托伊费尔·德雷尔著 陈亮光译 (327)

红犀照耀香格里拉 T.D. 奥尔曼著 刘敬师译 (343)

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

(美) M.C. 戈德斯坦著 扬凡译 (348)

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

是谎言还是事实

(美) M.C. 戈德斯坦 C.M. 比尔著

张植荣 李扬凡译 (373)

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

(美) M.C. 戈德斯坦著 张植荣 肖蓉译 (396)

达赖喇嘛和美国 詹·安德生著 李有义译 (442)

为西藏而斗争：利用宣传与公共

关系发动政治攻势

(美) A. 汤姆·格兰菲尔德著 刘浩译 (455)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1978—1990)：是谈判前的

准备还是死胡同？

(藏族)达娃诺布著 肖蓉译 (488)

编者赘语

(515)

序：国外藏学的演变与特点

杨公素

国外藏学对我国西藏历史、文化及宗教各方面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那时开始，先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越过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地区传教。他们关于西藏的游记成为西方藏学的最早研究材料。但只是到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人乔玛之始，西方的藏学研究才真正肇端。乔玛曾旅行至拉达克，并终生从事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研究。在他之后，西方对藏学的研究成为了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东侵后，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也潜至西藏，从寺庙窃走大量文物、经书及藏文典籍。由于藏文原始资料的增加，西方藏学逐步走向深入。这个时期西方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始于宗教和历史文化等内容，但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例如乔玛本人就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推动了藏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客观上为殖民主义侵略西藏提供了依据。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方对西藏的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其研究范围已从原来的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扩展到藏医、藏历及西藏民间艺术。国外藏学家队伍壮大，藏学专著不断涌现，藏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他们在继承早期藏学研究基础上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尤其是

1959年达赖集团出逃后，一些上层人士和高僧受到西方学术机构的聘用，壮大并推动了国外藏学。他们出逃时携带了大量藏文图书档案和重要历史文献，成为当代国外藏学的重要资料。正是因为达赖集团在外的广泛研究和宣传，使得当代国外藏学具有不同以前的特点：

1. 研究的焦点在政治问题上。他们著书立说，创办刊物，召开学术会议，游说世界。其中虽然有不少是纯学术的研究与探讨，但其主流包藏着祸心，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反共反华活动，为西方阵营利用西藏问题发动反华冷战寻找根据。这股研究，从1959年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到现在受雇于达赖集团的范普拉赫，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从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的角度，歪曲中国历史，利用西藏问题，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前者依据流亡集团的材料，向联合国提供了所谓的“调查报告”，成为联合国搞第一个所谓“西藏问题”决议的重要根据。后者于1987年出版的《西藏地位》，则从法律角度为“藏独”论寻找一大堆“合法”的理论依据。

2. 昔日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纷纷加入了藏学的行列，为分裂集团“歌功颂德”。黎吉生是其中的典型。此人是英国最后一任驻拉萨代表，在现代西藏史上，许多重要的分裂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的。如西藏外交局（1942），泛亚会议（1947），驱汉事件（1949）等。西藏和平解放时，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被赶出了西藏。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新西藏耿耿于怀。1959年10月，当他听说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后，深感世人对西藏的陌生，于是写了一本《西藏简史》。这本书歪曲中国历史，妄图为“藏独”论寻找

历史根据，并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是“侵略和占领”。因黎吉生在西藏曾长期任职（1936～1950），他关于西藏的书被国外藏学奉为权威。达赖集团出版发行的反华刊物及声像带还请他当顾问。

3. 因受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的影响，国外藏学界对西藏的研究存在着较多错误的观点。在西藏的历史地位、民国时期的西藏、西藏的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错误的认识，或者是故意的歪曲，用以攻击中国。而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他们或有掩饰，或为之辩护。对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视而不见，或歪曲报道，大叫什么“西藏人权问题”。

但是，在国外藏学界，也有不少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们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认真探索，客观地介绍西藏，研究西藏，探讨西藏的未来与发展。其中有许多藏学家为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不远万里，排除阻力，深入西藏从事实地调查，并写出了有份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应推美国人类学家M·C·戈德斯坦教授。他曾深入西藏西部牧区生活达16个月之久。他的研究基于长期的实地考察，自然比范普拉赫之流的信口雌黄来得客观与真实。也正因为这些，戈德斯坦的研究受到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攻击。跟戈德斯坦教授一样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的学者还有不少，如谭·格兰菲尔德、克里斯·穆林、节昂列夫等。

国外藏学界这股清新的学风正在兴起。它将对过去那种服务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研究形成强大冲击，并使国外藏学逐步走出误区。目前国内藏学界与国外藏学界的学术交流逐步展开。但是我们对国外研究的新成果介绍不够。北京

大学西藏研究小组有志于推动国内外藏学交流，组织翻译了这本译文集。集中的文章侧重反映二十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与地位；揭露英、俄、美等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与干涉；报道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问题；研究本世纪所谓的西藏问题的演变和西藏分裂集团近年来玩弄“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这些文章持论有据，观点中肯，有益于国内藏学界更好地了解国外同行。

北京大学西藏研究小组是由几位青年学者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稳定的研究经费。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藏学研究，期图为西藏的发展和祖国的团结事业贡献绵帛之力。近几年来，研究小组的成员先后发表了不少成果，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他们有一个打算，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开展与国外藏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使更多的海外人士客观地认识西藏，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廓清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散布的诬蔑政府的种种谣言与流毒。与此同时，他们也想把国外藏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涉及二十世纪西藏的成果译介到国内来，帮助国内藏学界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国外藏学研究的动态。

作为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老同志，我为有更多的青年一代关心西藏，研究西藏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从工作岗位上退居二线后，一直从事藏学研究，并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外交和西藏研究等课程。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感到有责任鼓励小组的青年同志们继续研究，早出成果，出好成果。研究小组约请我为他们编译的这本书作序，乃欣然从命。是为序。

1992年11月写于北京

为何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吴天威 著 杜永彬 译

编者按：吴天威博士是美国伊利诺斯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念完大学，于三十八年前到美国，在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1972年起，他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至今。现将他在《中美论坛》1988年5月号第4期发表的文章刊载。本文从生态、历史、文化等角度考察了西藏的地位。

一般人都认为，西藏是一个遥远的佛教国家，是最后一片“香格里拉”（净土），它座落在世界屋脊。在人们脑海里所浮现的西藏往往是一片终年冰雪覆盖、寒冷，不开化和荒凉的土地，是难以到达的外部世界。事实上，自从西藏历史的黎明时代始，它就在各方面都是敞开着的；只是在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才与中国中断了联系，这是由它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所造成的，而这种无能就成了对西藏产生种种误解的根源。这篇短文试图从生态、文化及西藏同中国关系的历史等方面阐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生态

我们头脑中的西藏自然图景所展示的是，西藏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面，它以圣城拉萨为中心，这一地区可称之为西藏本部。英国人、印度人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所称的西藏或“大西藏”，远远超出了“西藏本部”的范围，而除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拉达克西部和阿萨姆北部的阿克赛钦边界地区这块中印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外，西藏南部边界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明摆着的；西藏东部和北部的边界则是十分广阔和松驰的。自西向东，沿着昆仑山，于北纬 79° 、东经 91° 处转向北，穿越柴达木盆地，向东沿甘肃走廊抵达北纬 103° 处，然后向南折向四川；现今的西藏向南纵向切割了四川省三分之一的土地，这大约相当于旧日的康或喀木（近似于前西康省）。康属东藏，是大西藏的四大部分之一，其他三部分是青海、卫（内藏）和藏（外藏，包括被称为阿里的极西部地区）。藏区有250万平方公里，整个西藏高原包括西藏本部，青海、四川的三分之一，甘肃的六分之一，云南的十分之一的土地为藏族居住区，占全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提起西藏边界，人们就会想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他于1914年代表西藏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了领土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青海全省被宣布为自治区（青海是建行省而不是自治区，译者注），由六个自治地区组成，其中五个为藏族聚居，另一个既有藏族，也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四川省有两个自治地区，甘肃和云南各有一个自治地区。这些自治地方，合起来比西藏本部还要略微大一些，共有46332平方英里，并且

这些自治地方的总人口远远多于西藏本部。据1982年中国的
人口普查，西藏为1803393人，与青海一省的3895578人形成
鲜明的对比。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12000英尺；而以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为最高，平均海拔18000英尺；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脉之间的谷地，也就是雅鲁藏布江河谷、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海拔在12000英尺以下；西藏高原北部海拔在12000英尺以上，由几大山脉组成，即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等；再往北，则耸立着青海南部高原，平均海拔超过15000英尺；这些巨大的山脉东西绵延16000英里，（南北）宽400—500英里，耸立着许多支脉，构成了深谷和大河通道，著名的有长江、怒江（萨尔温江上游）、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和黄河，这些大江大河发源于青海、西藏，由众多的支流汇成，从而使整个西藏地形呈现出某些世界上非常独特的风景，这表明西藏并不仅仅是一个冰雪覆盖的荒凉世界。

虽然西藏的西北部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但是，在西藏内部，大部分地区气候复杂多样，动植物种类繁多，民族方言和习俗都不尽相同。而其种族构成则是相同的，尽管主要是蒙古利亚人和藏人，其东北部有高加索人。近年来在西藏南部的聂拉木和东北部的昌都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而且，这些文化遗存与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甘肃、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地方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遥相呼应，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历史考察

近年来，在西方盛行的错误观点认为西藏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事实是，早在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766—1112年），羌人就已存在，他们生活在现在的甘肃、青海或邻近地区，其中许多人后来迁徙到了西藏，并同当地的土著民族融为一体，现在已难以分辨。但是，今天的西藏人的祖先与羌人有着亲缘的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发羌”的那一支羌人部落，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就曾多次提到。

西藏作为单独的政治实体出现在拉萨南部的雅鲁藏布江畔，是在公元六世纪，当时被中国人称作“吐蕃”，这个词显然来自“发羌”。位于中国土耳其斯坦边缘的敦煌石窟中所保存的文献，描述了九世纪以前西藏的发展史及其与中国唐朝的关系。

在祖辈创业的基础之上，松赞干布（618—650年）时，不但巩固了他在西藏的统治，而且还从四面八方发动了一系列征服邻国的战争，进而占据了青海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和云南西部。因此而摆出了直接威胁中国唐朝（618—907年）的态势。后来虽然唐朝取得了对西藏人的胜利，并且把他们赶出了四川松潘地区，但是唐朝宁可姑息吐蕃而不愿同它再战，因而采取了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政策，于641年以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联姻，这是汉族文化开始影响西藏的标志。半个世纪以后的710年，唐朝金城公主与藏王墀德松赞（704—755年）联姻。安禄山起兵反唐之后，唐朝权势开始衰落，吐蕃趁机侵扰唐朝边境，进而攻占唐长安达十

二天之久。在吐蕃政权极盛时期，其边界向西扩展到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向北扩展到了甘肃走廊，向西南扩展到四川西北部，向东南扩展到云南西部的南诏王国。唐朝与西藏的友好关系随着823年“舅甥会盟”的建立而得到恢复，“盟约”保证，唐朝和西藏永远保持和平融洽的关系，并且划定了唐朝与吐蕃的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马洪线”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盟约”的条文刻成石碑竖立在现在拉萨的大昭寺前面。

十世纪唐朝灭亡，与之相应的是吐蕃的分裂并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后来中国新兴的宋朝(960—1279年)继续给予吐蕃封建主和教主以特权地位和封爵。从宋代开始，中央王朝就受到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如契丹、女真以及北方的蒙古和西部的党项羌的威胁。党项羌具有繁荣、发达的文化，它与西夏王朝(1038—1227年)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族在沙州(现敦煌)保卫西部边界，并成功地抵御了成吉思汗的进攻达三年之久，直到他们被蒙古军队完全征服为止。当西夏沦陷于蒙古之手时，党项羌的一支逃到了东藏，并在现乾宁和雅江地区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这个小王国延续了400多年，直到1700年才被清朝征服。

随着蒙古族的兴起，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成吉思汗1206年远征可可诺(青海)，他在这里会晤了西藏代表，并接受了西藏向元朝的归附。1239年，成吉思汗之孙阔端率领蒙古大军进入西藏，从而完成了蒙古对西藏的征服。1247年西藏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同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一道到甘肃武威(当时的凉州，译者注)的蒙古军营与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了联系。

忽必烈汗，这位后来的蒙古帝国的汗王和中国元朝皇帝，为年轻的八思巴（1235—1280年）和萨迦派所感动，1260年他刚建都就赐与八思巴“帝师”的封号，并要派他管理新建立的全国佛教机构，充任西藏政治事务的领袖，这是在西藏确立神权政治统治的开端。

明朝（1368—1644年）承接元朝，但它并未改变蒙古人对西藏的政策，继续向西藏封建贵族和佛教各派领袖封赐金印爵位，但不是象忽必烈那样只封授萨迦派，而是多封众建。更为重要的是，明朝与西藏间的供施制度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出现了汉藏贸易的繁荣。

清朝（1644—1912年）建立，满族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满族统治者意识到了西藏喇嘛教，尤其是黄教（或称格鲁派）对蒙古人所产生的影响。蒙古政权刚建立不久，就把军队派到了西藏。后来，围绕五世达赖的继承人问题，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且导致了1720年满清王朝的军事干涉。接着，清朝在拉萨驻军，并吞并属于川、滇的康区，从而取得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权。并且，满清统治者又把势力伸向外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阿里地区（这里由班禅喇嘛管辖，1600年，班禅喇嘛被宣布为转世活佛在札什伦布寺坐床任寺主）。这表明，在满清王朝确立统治的初期，就企图对西藏进行有效的控制，派驻军队于拉萨及北部的阿萨姆等就是实施其意图的有力措施。

即使在“民国”时期，在中国政权衰微时，袁世凯以及后来的蒋介石，都没有放弃西藏，并没有把它给与英国或印度的意图，众所周知，袁世凯拒绝接受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这就为中国后来否认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间的

分界线创造了条件。蒋介石当政时期，曾派遣了以吴忠信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西藏去管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即位典礼，从而消除了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种种误解。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胜过了历代中央王朝、蒙古族或满族对西藏的治理。自从1950年（应为1951年，译者注）中国军队开进西藏后，西藏当局在同年5月被迫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就大大增强了北京对西藏的控制。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建立，表明接管西藏的过渡阶段业已完成。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如象俄国共产党一样，宣称是无神论者，自然也就反对包括喇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这就损害了达赖喇嘛以及旧西藏统治集团的利益。中国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封建社会，而在当时的中国，再没有比西藏更封建的社会了。在西藏，寺院领主和贵族仅占总人口的5%，而他们却统治和奴役着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农奴制下的广大西藏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广大的西藏人民用委婉的术语“解放”比用于中国的其他民族更为恰当。在西藏的上层喇嘛和贵族领主看到自己统治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之时，他们便在当政时期千方百计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四处求援，从而引起了美国、台湾的国民党和对西藏极为关注的印度的注意。结果，1959年爆发了公开起义，随后便发生了达赖喇嘛和旧西藏当局大多数逃亡印度的事件。从此，他们开始掀起了独立运动。后来，中国在西藏镇压反抗时又做过了头，“文革”期间，又给西藏带来了很大危害。台北和北京都谴责西藏独立运动和最近发生的拉萨骚乱事件（1987年10月），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对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背叛。而

这些事件却得到了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一些同情和支持，原因很简单，就是流亡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要求保障人权和宗教自由，认为没有人能够剥夺这种权利，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在西藏的统治纪录却是如此之拙劣，以至使他们的人权保障成了一场笨拙的表演。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要保障西藏的人权，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发展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应当被看作人类的文化遗产。

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如前所述，新石器时代西藏的考古研究已展示了西藏民族及其文化与中国相应时期的文化和民族有着亲缘关系。历史记载表明，自西藏有史以来就同内地有所接触。但是，直到公元六世纪在西藏南部所出现的一个统治实体已很发达时，中国和西藏之间才开始建立起正式的联系。如象日本那样，西藏从唐朝大量地吸收了汉文化，这决不是巧合，中国盛唐文化的灿烂辉煌在中世纪是举世无匹的。

641年，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是中国文化传入西藏的标志。据说文成公主当时带去了1500名工匠，包括酿酒、纸、墨、铁匠、建筑等方面的手工，还带了3800种农作物种子和各种家禽家畜。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象农具、纺织、丝织、冶金等技术，随着历法、数学、医学等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当时必然会传入西藏。依照文成公主的要求，唐朝还送给西藏一些儒家经典，如《周礼》、诗集和文学作品，从而促进了西藏艺术和人们思维的发展。至